

青岛有座炮台山

许晨



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，有一座人们常说起的炮台山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远东唯一战场的遗址。此山本来叫做青岛山，因早年山下有个青岛村而得名。后来青岛村几经变迁，潮流涨落，成为具有“黄海明珠”“东方瑞士”之称的青岛市。

为何又称它为炮台山呢？因为除了南坡北岭矗立着几座一个世纪前的铸铁大炮外，还在于此地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发生了很多家国兴衰、悲欢离合的往事。

一个春光明媚、日丽风和的日子，我登上了这座不平凡的小山。说它小，是真的小，南北长约六百四十米，东西宽约三百一十米，面积三百三十亩左右，海拔只有一百二十八点五米，与那些昂然耸立的高山大岭不可同日而语，甚至不如某些地标性的摩天大楼高大，充其量只是一块平野中的高地。

然而，山虽虽小，却不可小看它。清末年间胶澳建置（青岛前身），始称“风台岭”“京山”，当地渔民叫它“青岛山”。后来，德国利用“巨野教案”强租青岛，以德国“铁血首相”俾斯麦的名字命名为“俾斯麦山”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本乘机侵占，企图长期据为己有，称为“万年山”，直到中国军民不断抗争，中国政府正式收回青岛，才又重新将名字改为“青岛山”。山名的变更，书写着历史的风云变幻！

站在这里，迎着吹面不寒杨柳风，大半个美丽的海滨名城尽收眼底；远望波光粼粼的黄海，岛屿青翠，轮船往来；近观红瓦屋顶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一派现代化都市的繁华景象。难怪清末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康有为晚年定居青岛，发出了“青山绿树、碧海蓝天，不寒不暑、可舟可车，中国第一”的感叹。

由此可见，青岛山的位置十分重要。它位于新老市区中心，背山面海，俯瞰岛城，当年的总督府、兵营、棧桥、闹市、入海口一览无余，既是一处最佳观景平台，又是扼守海防的战略要地。

清末，胶澳总督章高元曾在这座山上设防，现在还存有一尊清军铸铁大炮，可惜当时腐朽，清军无能，有炮也没打响。一八九七年德军占领青岛后，更为重视此地，大兴土木，在山的南北两处各建一座永久性炮台，并深挖山洞建成牢固的工事。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一九九七年，青岛市政府修复了当年的“德军要塞地下指挥部”，建起了反映青岛百年历史的炮台遗址展览馆。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，已成为青岛一战遗址

博物馆、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国防教育基地，是一处寓教于游的人文景观。

我与几位朋友就是慕名而来，参观遗址并重温这段史实。

正值中午时分，初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，山路两旁的青松翠柏一片绿荫，早开的迎春花、杜鹃花迎风微笑，在眼前呈现出油画的风景。脚下的石板小路犹如一条飘带，引领着游人步步登高。蓦然，我发现不远处就有一块铁制铭牌，分别写着：一八九七德国侵占青岛、一九一四一战爆发、一九一九五四运动、一九二二青岛主权回归、一九四九青岛解放……

哦，这是将当年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录在此，人们登上青岛山，就如同一步步走进青岛近代史。

山上建有德军历时六年修建的军事工程，设计巧妙，建造精湛，分别由南、北炮台和德军中心指挥部所组成，是德军侵占青岛后修建的九大永久性炮台之一，曾被德军誉为“青岛炮台之最要者”。一战期间，日德两军在这里进行了激烈的炮战，德军战败后自行炸毁了南、北炮台，唯有地下指挥部保存比较完整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主要在欧洲，简称为“欧战”，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远东地区的中国，并无涉及，然而，“贪心不足蛇吞象”的日本，看到德国无暇他顾，便趁火打劫乘虚而入，攻占了被德国占领的我国山东青岛。

此次，我们重点参观的是潜藏在地下的德军中心指挥部。它很坚固，位于南炮台后侧的山腰上，总面积一千六百多平方米，使用劈山、浇注、回模式施工方法建成。指挥部门前的石墙上铭刻着一行大字：青岛山炮台遗址。我与朋友在此合影后，钻进如洞口般的一道铁门，头顶上一排昏黄的照明灯，照亮了逝去的岁月。

指挥部内共有大小不等四十二个厅室，内部巷道纵横交错，串联各个房间和入口。依照地势和功能，分

为三层立体结构，局部五层，顶部装有铸铁旋转瞭望塔。内设两个蓄水池，分为指挥、生活、后勤三个功能区，设有作战指挥室、医务室、发电机房、锅炉房等等。三道保存完好的大铁门，具有防弹、防毒、防水的功能。

我们依次走进一号二号炮位、弹丸室、会议室等等，看到一些仿真德军士兵雕塑，有的在装填炮弹，有的在站岗值勤，还有的围着地图在讨论什么，俨然当年的情景再现。最后我们沿着窄小陡峭的台阶进入顶端的瞭望塔，从一条缝隙似的瞭望孔望去，整个城市港口要道一目了然。

如此规模之宏大、结构之复杂、功能之齐全的建筑，在当时堪称亚洲第一，是地下军事建筑的经典之作。西方列强在青岛留下了诸多楼房设施，这些旧炮台是帝国主义者侵略霸占青岛的铁证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，即“巴黎和会”。共有英、法、美、日、意等二十七个国家参加，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，曾派出十四万“劳工旅”奔赴战场，贡献非凡，理所当然也出席了会议，并准备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山东青岛的主权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永久和平，实际成为帝国主义者重新瓜分世界的“分赃大会”。

弱国无外交。尽管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，大声呼吁，在卑鄙无耻、穷凶极恶的日本威逼下，在列强私下勾结、互相利用的交易里，巴黎和会竟然通过了决议，把中国领土像商品一样转让给了日本！外交失败，强权战胜公理，消息传到国内，举国震怒，群情激愤！矛头直指日本列强与北洋政府！

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北京大学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，游行，学生们慷慨陈词，声泪俱下，有的学生攻破手指写下血书“还我青岛”！进而上演了“火烧赵家楼、痛打卖国贼”的一幕。很快，怒火燃遍全

国，罢工、罢课、罢市、抵制日货、游行示威，掀起了轰轰烈烈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。

时至今日，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，但那熊熊燃烧的爱国火焰，依然闪耀在历史的天幕上，那如山呼海啸的呐喊，依然回荡在人们的耳畔。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，不仅掀开了中国现代史的篇章，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以及赢得国家独立、民族解放打下了根基。

走出地下堡垒，从外面观看山顶上的瞭望塔，同样令人惊叹。据说这座塔自重六吨，连同框架一百多吨，由德国铸造的四大块厚二十厘米的钢板，由船运来，用螺丝铆合而成，可以抵御当时最强大的炮火攻击。这座塔圆顶方边，远远望去，犹如一个戴钢盔的德军士兵俯卧在那里。

然而，即使它固若金汤，也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最终成为一堆废铁，述说着曾经的历史，警醒着后来人。

置身山顶，近观远眺，整个城市犹如一幅现代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徐徐展开，我的心情也如同眼前的海水一样波翻浪涌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弹指一挥间，百年沧桑，时间不停地向前流淌，家乡青岛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，见证着中华民族从屈辱、苦难到奋起、斗争，终于迎来了昂然屹立、扬眉吐气的一天。整整百年，青岛映照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与悲喜。

前不久，四月二十三日，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七十周年的纪念日，我国在胶州湾举行了盛大的国际海上阅兵式，六十多个国家的海军派代表团参加，包括当年那几个列强的军舰，没有了“坚船利炮”的嘴脸，而是以和平友好的使者身份前来。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各国代表，并且登上中国自主研制的现代化导弹驱逐舰“西宁舰”出海检阅。

“有海无防”、落后挨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我人民海军以新型航空母舰、新型驱逐舰、新型潜艇、新型战斗机，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新型导弹、水雷、舰炮、电子战装备等武器系统昂首面世，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，乘风破浪，走向深蓝，护卫着万里海疆，维护着人类和平。

炮台山早已恢复了本来的名字——青岛山，就像一位默默无言的老人，历经风雨霜雪，见证沧海桑田。青岛山只有在新中国方能挺直腰身，扬眉吐气。正如开国领袖、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诗句所言：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！

“花满山，人满山，挤得蜜蜂蹄上天。人满路，车满路，堵得老何想上树……”这是今年“五一”假日我在某景点的感觉。山水如画，景明春和，然当我和千辆汽车堵在狭窄的山道上，一时万念俱灰，真想变成猴子爬到树上逃离。幸好想起当年“大串联”，坐闷罐车没吃没喝，心情便渐渐平静；此乃大快乐中的小烦恼，有水有面包车内还有空调，耐心等待就是了。

今年的“五一”假期，好像比往年出游的人更多。在北方，突然来临的好天气，无疑助力了。我和朋友们决定开车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景点一游。我们的设想很好：一小时路程，玩一小时，到县城吃顿饭，再从高速返回。可能很多人也这么想，结果就热闹了：出入景点只有一条窄窄的临湖山路，不是蝗虫胜利蝗虫的车辆蜂拥而至，挤得水泄不通。我们去的还算早，把车开进了停车场，然后只见人海，不见售票窗口和进园口。好在同行中有年轻人，买来票入了园，见到漫山的鲜花，心情变得愉快起来。将近晌午游览结束，想出园，就大不容易了。不过二十多里的山路，整整走了三个钟头。这还是好的，我们开了三辆车，两辆车返回承德是下午五点，另一辆还在停车场里没出来……

从电视上看到全国各大景区人流严重拥堵，我们不过是小巫见大巫。但亲身经历一次，就想问这怎么拥挤堵塞，为什么还要出去？原因是：你长假，高速路不收费，私家车越来越多，有了车就要找机会全家外出。而另一方面，各景区景点接待能力多是按日常情况设计，应对特殊时段则较弱，比如售票处和进园口，平时有三五个窗口，一个门就够了，忽然来了成千上万的人，还是这样，就会形成“瓶颈”，一时通不过去，造成拥堵。

在我国古汉语中，拥挤字意更多是“抱持”“围裹”“拥护”，以及拥簇、拥塞、拥塞等等。少有的“拥塞”才显示“围集”“壅塞”，如梅圣俞诗“夹道都人拥，迎风驱牡牝”，韩愈诗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”。可见古时人车不是很多，拥在夹道，拥在大雪。而“堵”字，本意是“堵”。“拥堵”一词用在今天，甚为合适：众多人车围拥，前面变成堵墙，神仙也难行。

假日出行出游拥堵，从本质上讲是生活富裕了。过去“五一”节，是地地道道的劳动节，要在家洗衣、做饭、劈柴、砸煤，干到晚上浑身散架一般，哪有时间、财力和心情去出游？现在不仅吃喝不愁，还不差钱，差的是怎么出去花钱，怎么消耗体内过多的能量。挤身“假日大拥堵”，费用、费钱、费精力，而且还磨性子磨性——急性子磨成慢性子，慢性子磨得没性子，没性子磨得能在喧闹之中思考人生、思考宇宙，然后从拥堵中走出，或大觉大悟脱胎换骨高人一头，或功亏一篑血压升高直

节后话拥堵

何申



奔医院，那就看个人的造化了。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富裕，假日出行出游拥堵或将成为常态，正所谓“非假日无以致远，非拥堵不是假日”。只是，此项非老年人之所宜，外出前，须看自己是否符合“三好”，即好性情、好体力、好心脏，三者缺一不可。那天见一老人红头涨脸，大声埋怨景区服务不周，时间不长，他自己就迷昏了。还有人登山登到半道，就吃速效救心丸……

唯有年轻人朝气蓬勃，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世界是他们的，假日的景区景点也是他们的！而我们老年人，夕阳有限好，体力近黄昏，旅游淡季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有的的是时间、有得是耐心，我们不怕路途远，不怕报价低，喝令三山五岳开道：我们来了！

然有趋势表明，未来旅游市场火爆，淡季不淡，那该如何？那咱们就在小区院里下棋、打拳、闲扯淡，或者出去玩遇到拥堵，回来后多思景点景色之美，把糟心的那段落了。若你问：头年被堵过今年咋还出来？甲答：一看到大好河山，把堵车都忘了！乙答：在家待着难受，堵，也要出来！丙答：不堵不热闹，不堵不欢乐！

灯下漫笔

大湾区与我们的文学写作

王威廉

地理有时候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重要，读古希腊史，就知道地中海的地理结构对希腊文明的诞生有着重要的作用。随着地球村全球化的发展，地缘优势更加凸显。

珠三角是我国最具地缘优势的区域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数十年发展后的必然结果。这种必然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，更是基于中国城市乃至城市带的快速发展。为什么此前没有提出大湾区的概念？因为此前珠三角的城市在经济、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还相对滞后。

以文学为例，很多年前内地占主流的文学模式是乡土文学，乡土文学跟港澳文学之间的交流是隔膜的。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，港澳文学以及流行文化成为珠三角乃至全国的引领者，这个过程也促进了我国当代城市意识的朦胧觉醒。以广州、深圳为主体的珠三角密集的城市带，因为地缘相近、语言文化相似，更得益于此。由此可以看出珠三角跟港澳之间的深层相似性，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，这种相似性、地域文化的因素而又超越了地域文化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大湾区的文化和文学才有了彼此更进一步理解的可能性。谈到广东的作家，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欧阳山、秦牧、陈残云等等。欧阳山的长篇小说《三家巷》是红色文学的经典作品，作品展现了革命的必然性与革命历程，而且对于广州市民文化的呈现极为生动，有着经久不衰的

影响力。欧阳山并不是广东本地人，他是湖北人，但他早在1926年就组织了广州文学会，并主编《广州文学》周刊。1949年以后，他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，因而广州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降地和源泉。秦牧是广东潮汕人，生于香港。陈残云生于广州，是新加坡归国华侨的后代，他于19世纪40年代在香港创作电影剧本。这几位作家复杂的创作背景，反映出了文化地理上的关联性与复杂性。

在这批老作家之后，有很长一个时期，广东作家在全国的文学圈里是边缘化的、没有太多声音的。不能说其中没有优秀之作，但影响力和认可度都有所欠缺。倒是流行文化，比如影视和音乐在全国取得了很大的影响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广东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：它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方，但其他很多地方的庞大人群依然处于农业文明而对其缺乏共鸣。这点对照陕西文学就有着鲜明的感受。陕西作家对于近几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力，涌现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作家：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。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？很显然跟陕西那块土地所蕴含的黄土文明有关。陕西是黄土文明或者说传统农业文明积淀最厚的地方，中国传统文明最辉煌的时代秦、汉、唐都在那块土地上，它的变迁能够最大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情感。

在我们提出大湾区的今天，文学的改变已经发生。作为祖籍陕西的我，对陕西文学的未来不免有些忧虑，它面临后继乏人的现象，这个现象有人说是“大树底下不长草”，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跟我国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。我国经历这么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后，能够唤起那种普遍性体验的文化不再是乡土文化，而是城市文化了。中国已经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“乡土中国”，乡土文化开始解体，它已经汇入到城市化发展的总体进程当中。原有的乡土经验已经不足以支撑这种新的生活经验，某种断裂感造就了新的审美范式。

而大湾区城市带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经验最丰富的地区，尤其是珠三角和港澳之间交通越来越便利，界限的阻碍越来越小。如果用年龄划分的方式，“80后”作家，包括“90后”作家，在活跃度和数量上广东都是首屈一指的。很显然这与广东的城市化成熟程度密切相关。这种极为成熟的文明，激发了文学的现代性审美。新一代作家既有本土出生的，也有移民的，有在本地接受教育的，也有在国外接受教育后又回归的，因而在创作背景的复杂性上接续了欧阳山那一代作家。

所以，我们得以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思考我们自己。我曾写过一个小小说叫《绊脚

石》，就写到19世纪70年代末，当时广东经济发展滞后，很多人选择了逃港逃澳。深圳作家陈秉安的纪实文学《大逃港》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，读完之后令人深感震撼。当年的夜晚，香港和澳门灯火辉煌，而大陆这边黑漆漆一片，黑暗中的灯火具备极大的诱惑力，有些人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跑到那片灯火。这很值得我们思考：一个人为了某种想象中的追求，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，那片灯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在香港、澳门之间来回游走，是如此自由。我们越过观念纠葛的藩篱，越过历史的阴霾，重新再来思考的时候，应该更加聚焦于人的内心。在辉煌灯光的照耀下，人们心中的那种向往和欲望到底是什么？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可以开启太多太多有价值的思考。所以，大湾区的文学写作是特别意味深长的，它不仅局限在地域性的层面，而是包含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一种历史与人性的复杂震荡，它的意义无比深远，这也是我置身其中深有感触的原因。

（作者系小说家、批评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鱼在盘子里想家

李良旭

父亲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。岁数大了，对许多事都已淡忘、模糊了，有时刚刚跟他的一句话，才过一会儿，他就忘了。让人很伤心。

听医生说，平时要多和老人交流，这样可以延缓老人大脑的衰老。遵照医嘱，我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，这样交流起来方便多了。每天将父亲安顿好，我就坐在父亲的身边，跟父亲说说话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我找他说话，他反而话更少了，总是躺在躺椅里，微闭着眼睛，并不搭腔。我就想方设法讲一些笑话，甚至高兴地讲我小时候淘气惹他生气，他拿小竹条打我屁股的事。尽管我哈哈大笑起来，可父亲却依然无动于衷，还侧了身子，将背对着我。

我尴尬地望着父亲，心里有些失落。我以为父亲嫌我照顾不周，就想想方设法改善他的生活，让他听广播、看电视，还经常搀扶着他到外面散步。可父亲变得愈加沉默，常常说上一句：“你有事去忙，别总在我身边，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好吗？”父亲的语气里，甚至有一种哀求。

我心里嘀咕道：老爷子可真怪！一天，和父亲吃饭。父亲看到桌上有一盘鱼，眼睛一亮，紧紧盯着那盘鱼，眼睛一眨不眨。我伸出筷子，想帮父亲夹一块鱼，父亲突然制

止道：“别动！”我说：“那您自己操。”可父亲依然两眼一动不动地望着那盘鱼，在父亲的眼里，就好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

我正不知所措地看着父亲，只听父亲喃喃地说：“鱼在盘子里想家啊！”说罢，父亲将那盘鱼端到自己面前，倔强地说了句：“我陪这条鱼一起想家！”
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拿在手上的筷子悬在半空中，久久没放下来……

我将父亲又送回到他自己的家。父亲一回到自己熟悉的屋子，精神好像立刻好了。他扔掉手上的拐杖，在几个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，好像看不够。和父亲说话，父亲的话好像一下子也多了起来，尽管刚刚说了一句话，他又忘了，可他兴致却很高。

一天，我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：一九九三年的一天，诗人顾城给翻译家尚德兰写了一幅字：鱼在盘子里想家。这幅字，尚德兰一直当作珍宝似的珍藏着。

看到这里，我心里一惊，那幕情景又在眼前浮现。原来，我把父亲接到身边，父亲觉得自己就像盘子里的那条鱼，他在想属于自己的河流啊，那条河流才属于他自己。心香一瓣